



重温抗战时期的伟大爱情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,是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这其中既有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英雄豪杰,更有他们身后那些默默支持、无私奉献的家人。

左权和刘志兰:为大义舍小家,深情不改



刘志兰 1917 年生于北京,是北师大女附中“民先”队长,后成为左权夫人。

在进步思想影响下,刘志兰决心投身革命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她奔赴延安,在朱德的牵线搭桥下,刘志兰结识左权。1939年4月16日,34岁的左权与22岁的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,左权深情用俄语夸赞妻子。

婚后,左权工作繁忙,夫妻聚少离多。1940年女儿出生,刘志兰既要带孩子又担忧丈夫安全。左权把母女俩接回八路军总部,尽可能地弥补对家庭的亏欠。夜里,怕她累着,左权爬起来为孩子换尿布。那是他们婚后少有的甜蜜温馨时光。

百团大战后,太行山局势危急,1940年8月30日,左权送刘志兰和不满百天的女儿回延安大后方,分别前拍了全家福,左权殷殷嘱托。此后两年,左权全身心抗战,只能靠写信缓解思念。1942年5月20日,他在信中表达对妻子的思念:“志兰!亲爱的,别时

容易见时难。分离廿一个月了,何日相聚,念、念、念、念。”可五天后,日军大举进攻,左权请命断后,头部中弹牺牲,年仅37岁。

无数个孤灯的夜晚,刘志兰饱蘸泪水,写下悼文。她谢绝组织安排,带着两岁的女儿远离丈夫工作地,决心坚强面对生活。左权牺牲6年后,她重新组建家庭,仍坚持赡养左权父母。1949年,左权母亲得知儿子已牺牲7年,为儿写下祭文:“吾儿抗日成仁,死得其所,不愧有志男儿。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,牺牲一身,有何足惜,吾儿有知,地下瞑目矣!”

杨靖宇和郭莲:你护国我守家,至死不渝

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,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。他身后,站着默默支持他的妻子郭莲。

起初,杨靖宇与目不识丁的农家女郭莲结合不被看好,但他们情投意合,婚姻幸福。杨靖宇教妻子读书识字,讲忠臣义士故事;郭莲敬爱丈夫,决心支持他的理想。

1926年,儿子出生,杨靖宇也成为共青团员,回确山开展农运工作,他选择投身革命,与妻儿短暂相聚后再次踏上征

程。此后,家园被毁,郭莲带着婆婆和孩子颠沛流离,在草棚里艰难产下女儿,孩子出生5天后,杨靖宇才寻到家人,短暂相聚后又要出发,临行前他留下照片和家书,不想这次分离竟成死别。

1929年春,杨靖宇赴东北领导工人运动,后积极领导东北抗日斗争。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令日伪军疲于奔命。后遭叛徒出卖,1940年2月23日,杨靖宇在艰苦条件下奋战6个昼夜后壮烈牺牲。

杨靖宇投身革命期间,家人受迫害。1938年,杨母含恨离世,郭莲带着孩子拾荒讨饭,守望丈夫归来。1944年,敌人逼问杨靖宇下落,对郭莲严刑拷打,汉奸还将她扔进粪坑,郭莲奄奄一息时,仍把丈夫照片交给儿女,让他们找爹。

郭莲苦等16年,却不知丈夫早已牺牲。有些等待虽无回响,却震耳欲聋,郭莲用朴素坚守,为家国大义作了震撼注解。

沙飞和王辉:家国命运相连,历经波折

沙飞,中国革命摄影事业先驱,他的一生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,其爱情也在战火中历经波折。

九一八事变后,《松花江上》传遍全国,广东省汕头市电报局职员沙飞(司徒传)和王辉(王秀荔)热血沸腾,推动电台成立救国会,积极抗日救亡。1933年3月,两人在共同理想中步入婚姻殿堂,随后一双儿女相继出生,家庭温馨美满。

为蜜月旅行买的相机让沙飞着迷,他投入大量钱财钻研摄影,认为摄影能为抗日救亡服务。1936年,看到外国



画报上萨拉热窝事件照片后,他决心当摄影记者记录历史。此后,他四处奔波拍摄,发表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。但王辉认为摄影不稳定,难以支撑家庭,加上自己抗日运动繁忙,照顾孩子吃力,便写信希望沙飞回家,否则离婚。沙飞痛苦挣扎后,同意离婚,毅然奔赴抗战前线。

王辉也投身抗日,1936年冬参加“潮汕抗日义勇军”,1937年9月入党,还参与发起“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”。因工作危险,她将孩子送到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。1940年,她辗转在贵阳找到孩子,当时孩子瘦弱不堪、疾病缠身。因工作紧急,她再次与孩子分离,后经组织安排,孩子才到

延安与她团聚。

王辉患病时,看到沙飞的作品后,理解了他的选择。1944年,她到延安学习,打听沙飞情况,得知他未再婚。邓颖超鼓励他们恢复关系,王辉写信告知沙飞自己和孩子的情况。沙飞看到电报后毫不犹豫同意复婚。后又生育3个孩子,一家人也迎来安宁幸福的日子。

但命运弄人,沙飞因战争打击、精神异常。1950年3月他因在医院枪杀日本医生被处决。王辉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,依然坚强面对,独自抚养5个孩子。1985年沙飞被鉴定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,1986年恢复军籍和党籍。2005年5月,王辉安详离世,与沙飞“团聚”。



袁国平和邱一涵:爱国亦念家,薪火相传

袁国平 1906 年生于湖南邵东,1925 年入党。入党后,袁国平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相连。1929 年,袁国平邂逅来自湖南岳阳的邱一涵。共同的理想点燃爱情之火,两人结为伴侣。他们婚后育有三个孩子,长女寄养乡间后杳无音信,次女夭亡,儿子袁振威诞生于抗战期间。

1938 年 4 月,袁国平从延安来到新四军军部,妻子邱一涵紧紧跟随。他主持制定政治工作体系草案,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三年培养 4000 余名骨干,将新四军政治工作体系打造成典范。邱一涵右手曾负伤致残,就苦练左手写字,帮丈夫承担大量抄写工作,二人恩爱,1940 年被评为新四军“模范夫妻”。

1938 年,袁国平组织创作的《新四军军歌》响彻大江南北,成为凝聚军心的号角。当时“亡国论”盛行,侄子袁振鹏来信忧虑,袁国平回信坚定抗战必胜信心,鼓励其担当大业。他因出色的宣传鼓动能力,被毛泽东评价为“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”。

在邱一涵怀孕 7 个月的时候,袁国平奔赴前线,面对哭泣的妻子,他轻轻擦去邱一涵的泪,说:“若是女儿就学音乐,若是男孩便送去参军。”1939 年 5 月,袁振威出生,8 个月大时被送回老家,这竟是袁国平最后一次见孩子。

1941 年 1 月,袁国平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,年仅 35 岁。母亲思念成疾哭瞎双眼,年幼的袁振威牵着奶奶讨饭。1956 年邱一涵病逝,袁振威成孤儿,党和政府送他读书深造。他牢记父亲期望,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,后成为海军指挥学院教授,为国家培养了众多军事人才。

袁国平在 2014 年被列为首批著名抗日英烈。

(本版稿件综合《婚姻与家庭》《文史博览》等)

在法门寺发掘的日子

1981 年 8 月 24 日,位于陕西扶风县城北的法门寺真身宝塔——明代万历年建造的十三级楼阁式砖塔,在经历了 300 多年的风风雨雨后,因雨水浸渗而半边坍塌。

1986 年 12 月,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,在基本建设前,需要对塔基部分进行发掘清理。1987 年 4 月 3 日,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曹玮在主持清理塔基工程中,意外发现了一个深洞和珍藏于内的金银器。扶风县博物馆馆长淮建邦协同曹玮一起赶赴西安,将这个信息报告给陕西省文物局,与此同时,扶风县文化局也将这个重大的消息电话通知给宝鸡市文化局。我当时还在文化局文物科任科长,4 月 4 日,我和白局长一起来到了法门寺。

我们根据省文物局的指示,成立了法门寺地宫考古队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任队长,韩伟老师和我、扶风县博物馆副馆长付升岐 3 人任副队长。

随时有崩塌的危险

1987 年 4 月 5 日,根据计划,韩伟老师指挥王宝平、吕增福、徐克诚等人在罗汉殿北和真身宝塔之间进行钻探。我们在罗汉殿北 8.4 米的地方,发现了地宫的入口。

4 月 9 日 10 时 15 分,我们下到第一道石门处,研究开启石门的办法。最后采用机械的办法,硬将锁柱与锁孔分开。清理工作从南向北渐次

进行着,11 时 26 分,在甬道的北端,我们发现了物帐碑和志文碑。韩伟老师对碑文进行考释,从而知道了地宫中存放文物“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、枚、领、张、口、具、两、钱字等”,而且金银器达 120 多件,还有秘色瓷和大量丝绸织物。

搬走石碑后,里面暴露出了第二道石门,高仅 72 厘米,宽 64.2 厘米,人需爬行才能进出。面对门上的铁锁,我用一根细钢棍从钥匙孔中插入,反复振动后打开。但只见前室破坏严重,地宫数百年形成的平衡已经被打破,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。

发掘工作紧张地进行着,第二组的任务也十分繁重,当他们打开天井盖子以后,发现了盖的内底还有金银箔制成的地宫后室莲花藻井,制作精美。因为后室装满了文物,绘图人员无处下脚,只能用绳索把人从井口吊到半空进行测量。

22 时 10 分,我们又打开了第三道石门,只见高为 161 厘米的白石灵帐位居中央,雕刻高贵华美,装彩色泽浓艳。灵帐前面放置一个象首金刚铜熏炉,左前方放有净水瓶等珍贵的供养器皿。

4 月 11 日上午 10 时,我们进入中室,绘制平面图,做文字记录。第二组的绘图记录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。19 时 10 分,我们要亲手提取清理出来的文物,工作场地极为狭窄,灵帐外围只能侧身而过,地下还有丝绸等文物,更增加

了清理的难度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走进中室做最后的发掘工作,共清理瓷器 13 件。第一组的工作已近尾声,大部分文物已经被取出。与此同时,12 日上午,第二组的绘图已经完成。22 时 30 分,后室的清理工作开始了。

迎真身金钵盂、鎏金银龟盒、各种琉璃器等 45 件组文物被悉数取出,时间已经是 4 月 13 日的凌晨 3 时。早上 9 时,从地宫后室中又清理出 33 组茶具和首饰,至此,后室地面文物的清理工作宣告结束。

全世界首次发现

1987 年 4 月 20 日,我在中室继续做发掘扫尾工作,曹玮在清理后室,至深夜零时,他发现北壁下一立砖有异常现象。4 月 21 日,他们发现了一个秘龕,用手触摸,有小琉璃球一枚,随后又发现龕内有一个铁函,在这个铁函中存放着一千多年前,唐代的皇帝和臣民为之断臂炼指、焚髓荐乳而供奉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,这在全世界是首次发现。

1987 年 4 月 24 日,地宫的发掘内容只剩下中室的大揭顶了。顺利揭取顶部石条后,4 月 28 日凌晨 1 时,石条与灵帐之间被挤压在一起的金袈裟露出,工作人员将其清理后又挪开灵帐盖,发现帐身为方筒状,筒内有丝绸包裹的铁函,西北角还有金银丝编织



物。在筒内没有空间,无法工作的情况下,发掘被迫暂停。经研究后,4 月 28 日上午,决定提吊帐身,现场清理。15 时,盖板被全部打开后,发现了金丝鞋一双。

4 月 29 日 6 时 30 分,王杼面对灵帐内很难提取的文物,想尽办法将薄板插入帐底,取出了金丝鞋,又陆续清理出铁函、丝绸残片、钱币等文物 16 件组。后来在室内整理时,才发现铁函中还存放着武则天迎请供奉的舍利。

9 时 50 分,灵帐的须弥座被吊起,下午对禅床进行了清理,对中室地面进行钻探,证明了中室地下再无文物埋藏。至此,法门寺地宫的田野考古发掘工程宣告结束,从此转入室内整理阶段。

5 月 14 日,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圆满完成。共出土 4 枚佛指舍利,121 件组金银器,17 件琉璃器,16 件瓷器,12 件石器,16 件铁器,19 件漆木杂物,约 400 件(粒)珠玉宝石,还有大批丝织物品,文物数量之多、品类之繁、质量之高在唐代考古史上是空前的。

(本文作者任周方,系宝鸡市文物局原局长,本文摘自其所著的《三秦印记·乡土·陕西考古人说》一书,有删节)

唐朝也有「七步诗」

说起曹植的那首《七步诗》,可谓无人不知。而在唐朝,也曾出现过一首诗,堪称唐朝版的《七步诗》。

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一共有 4 个儿子。身处太子之位的是武则天的长子李弘。李弘天性善良,为人处世与母亲武则天冷酷狠辣的政治手段格格不入。后来,唐高宗李治病痛加重,无法独自理政,武则天以天后的名义代理朝政。而此时,太子李弘的身份就成了武则天在攀登权力巅峰路上的最大绊脚石。武则天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痛下杀手,以毒酒鸩杀。

李弘死后,武则人次子李贤继位皇太子。可没过多久,宫中就有流言说李贤不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,而是武则天姐姐与唐高宗的骨肉。恰好武则天宠信的江湖术士又对她说李贤的面

相不适合做太子。李贤顿时不寒而栗。

就在这时,武则天给李贤送来了《少阳政范》《孝子传》两本书,指责李贤不仅不会好好当太子,连儿子也当不好。自感命不久矣的李贤在这个时候,无比悲凉地写下了《黄台瓜辞》,希望可以唤醒武则天的母爱:

种瓜黄台下,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,再摘使瓜稀。三摘犹自可,摘绝抱蔓归。

身处流言蜚语之中的李贤,在诗中通过瓜果比喻,劝母亲念及骨肉之情,不要对亲生儿子赶尽杀绝。其寓意与曹植的《七步诗》不谋而合。

但李贤的这首肺腑之诗并没有打动眼里只有权力的武则天。她先是李贤流放巴州,最后又派酷吏赶往巴州,逼迫李贤自尽。

(摘自《知识窗》)

徐悲鸿创作《放下你的鞭子》幕后

1939 年秋,为了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,筹集捐款、救济难民,徐悲鸿远赴南洋举办画展。就在徐悲鸿抵达新加坡时,著名话剧演员王莹已在那里马不停蹄地演出抗战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

《放下你的鞭子》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,从东北沦陷区逃出的一对父女流离失所、卖唱为生的故事。

这一天,徐悲鸿在街头徜徉时,适逢王莹等人在广场上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于是驻足观赏,不由得深受感动。徐悲鸿回到住处,花了 10 天左右的时间,以现实主义手法,创作了一幅高 144 厘米、宽 90

厘米的同名油画。画面上,接近真人比例的王莹身穿白底蓝纹、绘以麟凤图案的服饰,手持红色绸绢,半蹲身子,翩然而舞;围观者扶老携少,或衣衫褴褛,或军服持枪,双手交叉,神情陶醉……

据徐悲鸿夫人廖静文介绍,徐悲鸿完成油画《放下你的鞭子》后将它送给新加坡的好友黄孟圭。黄孟圭去世后,画作辗转流传到一位亚洲收藏家手中。2007 年 4 月《放下你的鞭子》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惊艳亮相,轰动一时。

(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周惠斌/文)